

编译参考 增刊

国 外 思 潮

(二)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

〔法 国〕夏尔·贝特兰

〔加拿大〕尼 尔·伯 顿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

[法国] 夏尔·贝特兰

[加拿大] 尼尔·伯顿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

1979年6月·北京

目 录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 (刘纪康译)

- 《每月评论》编者的序言…………… (5)
夏尔·贝特兰：《致法中友好协会的辞职信》…………… (7)
尼尔·伯顿：《为新政权辩护》…………… (11)
夏尔·贝特兰：《大跃进》…………… (31)

附录

- 陈志让：《“大跃进”剖析》(林德彬译)…………… (113)
琼·罗宾逊：《1978年的中国》
(陈清译)…………… (128)
- • •

转载

- 叶·盖·瓦尔加的“遗言”：
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及其结果…………… (139)

出版说明：

美国《每月评论》1978年7、8月合刊是一期专刊，总题为《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共收入三篇文章：夏尔·贝特兰辞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职务的信件；尼尔·伯顿的《为新政权辩护》；以及贝特兰的《大跃进》。《每月评论》的两位编者保罗·斯威济 (Paul Sweezy) 和哈里·麦格道夫 (Harry Magdoff) 为专刊写了简短的序言，说明了这一期专刊的由来。

斯威济在美国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前辈” (dean of Marxist economists)。他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多年来，他和列奥·休伯曼 (Leo Huberman, 已去世，由麦格道夫接替) 合编《每月评论》。他们曾多次来我国访问，过去对我国的态度总的说是友好的。但是，他们跟贝特兰的关系很深。这次出专刊，貌似公正，但整个版面安排显然对贝特兰有利。

现将这本专刊，包括序言，全文译出。另外，选译了反驳贝特兰的两篇文章：陈志让写的《“大跃进”剖析》和琼·罗宾逊的《1978年的中国》，也编成一个专集，供有关方面参考。

夏尔·贝特兰，法国经济学家，今年66岁，多年来从事苏联计划经济的研究，写过几本著作。近十年来研究苏联变修的问题，写了《苏联阶级斗争》三卷，其中头两卷《苏联阶级斗争——1917—1923》(Les Lutttes des classes en U.R.S.S. — 1917—1923) 和《苏联阶级斗争——1923—1930》已经出版。文化大

革命期间，他曾两度来我国访问，著有《中国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由《每月评论》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攻击我国“现在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并于1977年5月11日致函法中友协，辞去该协会主席职务。后来他写的《大跃进》一文已经不仅是对尼尔·伯顿公开信的答覆，而是如他自己所说，是对1976年10月以后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变化及其背景的系统的虽然是初步的分析。贝特兰在西方有一定的影响，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极“左”观点有代表性，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并给以正确的答复的。

尼尔·伯顿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曾在北京大学进修中文和哲学，现在广播事业局工作。

陈志让(Jerome Chen)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长期在英国工作，曾写过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现任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教授。

琼·罗宾逊是英国经济学家，今年76岁。早年因著有《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而成名。她还写过其它许多著作，包括一些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文，和《中国的文化革命》(1970)。

以上三篇驳贝特兰的文章包含一些很好的论点，但还使人感到不够系统深入，也还有个别地方不得要领。鉴于极左思潮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对贝特兰的全部论点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批判，也有待我国的理论、宣传工作者努力。

• • •

本期发稿后，收到今年5月号《每月评论》。这是一本中国特辑，是《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的续集，内容包括该刊两主编

的一篇文章和五篇驳贝特兰的来稿。《每月评论》两主编的文章对胡乔木同志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要受到资源、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不是根据客观规律来决定的。特辑所选登的五篇来稿中有两篇本刊本期已经译载，《每月评论》两主编的文章以及另外三篇评贝特兰的文章，本刊将在下期译载。

另外，经中联部苏联研究所同意，本期转载该所的《苏联资料》1979年第2期叶·盖·瓦尔加的“遗言”：《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道路及其结果》，供有关方面参考。

——编者

序 言

《每月评论》编者

5月11日，夏尔·贝特兰提出了他辞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职务的辞呈，其中说到他对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情况日益感到担忧，对于毛以后中国领导及其政治路线的态度跟友协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一派有分歧。贝特兰教授的辞职信经〔法国〕《世界报》略加删节予以刊载，通过这个途径以及其它途径传达给对人民共和国感兴趣的广大国际读者。

几个月后，1977年10月，一位在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加拿大人尼尔·伯顿给贝特兰教授一封公开信，作为对他辞去友协职务信件的答覆。伯顿先生把这封公开信的副本寄给贝特兰教授和《每月评论》的编者，并附来一封说明信，建议《每月评论》发表辞职信原件，他的（伯顿的）覆信，以及贝特兰教授愿意提出的任何答辩。按照这个建议，我们询问贝特兰教授（他的《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由每月评论出版社1977年出版）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工作。他回答说愿意，然而由于手头有其它工作，在若干月内还顾不上。这说明为什么将近一年前提出的计划，直到如今方才实现。

关于他在3月21号写完的那篇文章，贝特兰教授在其法文版序言中写道：“如读者将会看到的，我给尼尔·伯顿的信，与其说是一封简单的回信，不如说是对于中国在1976年10月以后所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为这些变化扫清道路的那些条件所进行的初步的系统考虑。”

辞职书

致法中友好协会

夏尔·贝特兰

1977年5月11日

亲爱的朋友们：

众所周知，毛主席逝世后发生的事件使我深为担心。象中国的许多其他朋友一样，我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四位领导人遭到逮捕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十分忧虑，须知他们四人——除了江青以外——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

对“四人帮”提出的“他们企图进行政变”的指控根本无法令人信服。那些成功地进行了政变的人总是声称那些被赶下台的人“企图以武力夺取权力”。

考虑到这些事件的政治后果，我的疑问更加深了，因为被捕的领导人中的两位——姚文元和张春桥——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的分析作出了重要（尽管不完整）的贡献。

然而，不管有什么忧虑和疑问，我在表明立场之前，必须了解现在取得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那些人提出了什么样的论点和实际上将执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不幸的是，1976年10月事件以后的六个多月中所发生的事情，恰恰证实了我的忧虑。

过去和现在对这四个人进行批判的方法，与毛主席的教导毫无共同之处。在公开发表的材料中，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只是诽谤和丑闻。水平之低说明了中国现领导没有能力对这四个人的路线开展任何严肃的批评。

在反对这四个人的运动中，人们会发现有些指控正好适用于现任领导的所作所为。人们读到那四个人采取了修改照片的手段，表明他们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卑鄙的阴谋家和机会主义者”（新华社1977年3月20日电讯）。对于修改照片和歪曲历史事实当然应该谴责，但是，如大家所看到的，目前这些作法正被广泛采用。例如《中国建设》1976年11—12月号合刊就公开刊登了修过版的照片。

对这四个人的其它指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例如，谴责张春桥想对现今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被称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其它的一些谴责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假使接受这些谴责，诸如那四个人在饭店吃饭不付钱、江青订做“女皇服”之类，则会使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生活方式提出严重的疑问。

最后，其它的指责竭尽夸大之能事，甚至到了公开歪曲事实的地步，全是粗暴的捏造。最近几个月的报纸杂志说那四个人过着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王洪文则被说成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四人被说成是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并且百分之百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被称作是共产党、工人阶级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死敌。他们搞特务活动，对外投降，进口供他们的特务使用的器材和奢侈品。他们被说成蓄意挥霍国家资金，破坏社会主义积累，热衷于物质刺激。他们甚至于被描绘成国民党特务。

如果这些指责是符合事实的话，那只能使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份及毛主席的警惕性产生最严重的怀疑。如果这是属实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预料现领导中的某些或全体成员也将在适当的时候被揭露为犯有“为敌人进行间谍活动”罪行的国民

党特务。

但，假使这些指控与事实不符，如我所相信的那样，人们是不可能信任那些靠消灭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来欺骗人民的领导人的；他们不是将分歧的基础解释清楚，而是采用污蔑性的攻击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得出如下结论，即：这种对毛泽东政治路线的忠诚仅仅是为了掩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而施放的烟幕。事实上，对最近几个月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研究以及对有可能加以判断的具体实践的研究，使我认为：现在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批邓已被放弃，要求将生产置于革命之上的呼声甚嚣尘上。纪律和秩序得到赞扬，人民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已不复存在，当然更谈不上对资产阶级政策造反的权利和义务了。妇女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地位被否定了，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已很少提到。共产党内存在着资产阶级的问題也象变魔术般地消失了，对阶级斗争的呼吁已被对那四个人进行斗争的号召所取代。

总的看来，对这四个人进行必要批判的出发点是修正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在他们可能有的错误言行和正确观点之间是不加区别的。更确切一些说，用他们的错误来否定他们的正确分析，这不但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相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强了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所知道的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证实了现行政策的修正主义方向。工厂的规章制度变成压迫性的，开门办学基本上放弃了，这意味着在口头上空谈文化革命的同时，它的成果正付之东流。

就外交政策而言，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正逐步被仅仅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所取代。结果，对美帝国主义的谴责

越来越少。它和它的盟国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干涉甚至常常被认为是“积极的”，扎伊尔事件就是一例。须知，当两个帝国主义匪徒互相争夺时，拉一个打一个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目前在国际上的作法损害了她在人民中的威望，特别是在第三世界人民中的威望。事实上，这些政策正中社会帝国主义的下怀。

这就是现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迫使我作出的判断。我们手头掌握的材料太少，无法了解反对现行政治路线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这种力量肯定是存在的，过去几个月中镇压活动的规模已证实了这一点。对于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和在多长时间后才能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是无法预测的。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正竭力利用国外的赞同来试图提高其在中国群众中的威信。这样，表示赞同目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或甚至仅仅保持一种似乎是赞成的态度，既不会有助于中国人民，也不会有助于那些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人们。

法中友好协会现正被一种支持中国共产党现领导的潮流所控制——他们全然不顾协会中许多中国的朋友所持的怀疑态度。我就此得出结论，我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的作法是正确的。这也就是我在这封信中所要做的。我要求你们将我的辞呈转交全国执行局和协会的成员们，并全文在《今日中国》上刊载。

谨向您们表示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夏尔·贝特兰

为 新 政 权 辩 护

尼尔·G·伯顿

1977年10月1日

亲爱的贝特兰先生：

我在今年早些时候得知你辞去了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感到十分震惊。由于我读过你的许多著作（与保罗·斯威济合著的《论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一卷），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因此我非常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和怎样的分析使你得出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正在中国获胜的结论。我直到上星期才有机会读到你的辞职书的全文。

在看你的信时，我发现你提出的那么多观点正是去年给了我很大麻烦的观点——也正是其它为中国感到担忧的朋友们提出的观点。但是当我看见你的信后，我不得不认为你的分析并不充分，而你认为修正主义路线已占统治地位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对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怎么会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呢？

我反复地读了你的信，进行了思考。我愿提出一些题目供你考虑。我不准备详细地答复你每一个疑问，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做需要大量的佐证文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本人仍然赞成你的部分观点。另外，还因为我认为你的大部分疑问是由极少数值得商榷的实践和理论的假设引起的。由于我认为这些假设在中国以外传播甚广，我想比较详尽地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并希

望把它作为一封公开信发表，这样其它人也可以加入讨论，使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得以澄清。

首先，我认为你的结论下的太仓促。所有我们这些对中国并不仅仅抱有一时兴趣的人，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无法肯定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国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这些中国的朋友和支持社会主义的人都生怕会出现反复或修正主义。与许多中国人不同，我相信中国的外国朋友中，大多数——特别是那些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范围内来理解中国的人——对那些实际发生的事件是没有充分准备的。当然，我们与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一样，认为这种反复只能来自右派。但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所未能理解，或至少是没有现实地把握住的是，在中国，右派是很臭的，所以他们只能以左的面目出现而不可能以右的方式出现。但即使我们看出了这一点，由于我们消息来源有限，我们对所发生的事件比许多中国人更没有准备。我们当中擅长理论的人肯定地认为，我们至少能够知道谁是真正的“革命者”，因此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被称为“实用主义者”和另一些被称为“官僚主义者”的领导人身上。无论如何，关于这些人的才智并没有足以引起我们注意的成文的东西。最危险的右派分子已在批判邓小平和他的“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解决了，或至少从我们能读到的报刊材料看来是这样。所以当已预料到、但仍然令人震惊的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的担心似乎减轻了一些。关键在于，即使我们对去年10月惊心动魄的“反复”毫无准备，我们也仍然能把它放在现成的逻辑范畴之内来加以考虑。

你信中说对那四个人的倒台，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否定的。但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你迟疑了一下以免过于匆忙草率。你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考虑到我的立场，我像你一样非常希

望看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并使之得到巩固。我也像你一样，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工具去认识——并且希望去改造——世界。和你不同的是，我在中国是一名“专家”。即使这样，我也和你一样没有特殊的消息来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事先对10月的事件作准备。由于我的利益（如果不是我的经验）似乎与你大致相同，我猜想我的逻辑范畴（尽管我在中国已呆了三年）与你也没有多大区别。因此，我的最初反应和你很相像。但这里有一个复杂的因素。与你不同的是，我是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毕竟，一个认为他为之工作的事业已误入歧途的人还会再为此工作多久呢？

那么，又是什么使我继续留在这里呢？仅仅是机会主义吗？我宁愿不这样想。倒不如说，是我立即发现我自己的逻辑范畴出了问题，并恍然大悟，原来使我误入歧途的正是我从中获得了大量有关我周围的政治事件知识的宣传——文字宣传。那么我是如何辨认出我的逻辑范畴所出的毛病并开始加以修正呢？坦率地说，这是在经历了许多混乱、痛苦和内心的反省之后才做到的。

我是在上海听到第一个关于逮捕那四个人的官方消息的。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欢庆那四个人垮台的盛大街头游行。那已是逮捕后两周了，大约在我听到“美国之音”播出的这一消息后10天，也是我在中国东部的蚌埠看见反对那四个人的第一批大字报的一个星期以后。我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上海，在那四个人的据点，会看到如此众多的人群，表面上带着如此高涨的激情，欢庆一个在我看来是“反复”的事件。当然游行是有组织的。（对一个外来者说来，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是有组织的。）但要假装欢乐雀跃并不容易，这从早些时候邓小平下台时举行的游行明眼人就看得出来。是否这也是像某

些西方分析家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为了让上层领导人的权力斗争剧合法化而组织的一次毫无意义的仪式的又一个部分呢？难道在社会主义内部真有那么多人等着瞧那些在我看来是主要鼓吹者的那些人垮台？难道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理论的梦境中而大多数人民则真的赞成资本主义？难道毛主席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说错了？我当时不能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必须承认我所依赖的逻辑体系是不充分的。

几天后我回到北京的家庭和朋友们、同事们中间。我们彼此是了解的。虽然我的中国同事们表现出的热情程度不一，但大多数看来都非常满意事态的变化。我也发现，他们并不自发地与我谈论这一问题。但当我对那四个人受到的某些指控（特别是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对江青的指控我没有疑问！）提出疑问时，虽然我的中国同事也试图回答，但我总得不到满意的答覆。即使现在（是否可以说特别是在后来）当向我宣读了大段“解释”那四个人的问题的中央文件之后（这些文件在游行前就在工作场所向中国群众宣读过了），我仍然觉得这些指控相当无力。对此，我以书面形式向我工作单位的领导提交了一份列有20多个具体问题的单子。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一位上级来找我，并尽最大努力解释我提出的问题。但我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为什么对我提出的很明确的问题，我无法得到直捷了当的答案呢？一种可能性是，也许我向之提问的这些人也没有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吧。另一种就是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使用的分析方式不一样。

我和我的夫人及其它非中国人的朋友谈论时则感到更自在一些。即使他们不总是能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他们至少能明白我的问题所在。有时我们讨论争辩直至深夜。那些比我在中